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韩非子全译

〔战国〕韩 非 著 张 觉 译注

（上）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韩非子全译

（战国）韩 非 著 陈 奇 恒 译

（上卷）



贵州人民出版社

B226.5

02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韩非子全译

〔战国〕韩 非 著 张 觉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克(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钺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典，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中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豹，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 50 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可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

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年9月

前 言

中国传统文化，时下受到人们的重视。但令人遗憾的是，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往往只大谈儒家思想，而不谈法家思想；往往大谈孔、孟，而不谈韩非。其实，只要稍稍对中国历史有所研究的人都会发现，儒家思想虽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宗奉，但韩非的一整套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策略却也始终是历代君主独裁政治的理论基础。只是韩非的一套术治理论过于刻露，因此历代统治者大多只是走私式地运用它罢了。所以，应该说，阳儒阴法才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如果没有法家思想的授精，儒家思想是决不会孕育成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混血儿的。抛弃了韩非思想而侈谈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不能精辟地解释中国的历史，而且也不能深刻地了解中国的现在。更何况韩非提倡严格的法治，这虽然因为限制了各级官吏的谋私活动、妨碍了君主的为所欲为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贬抑，但它也正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值得宏扬的宝贵遗产。因此，深入地读一下《韩非子》，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韩非子》作为先秦的一部重要典籍，能够经历二千多年的筛选而仍然广为流传，就不仅仅是因为它影响了二千多年来的传统意识形态了。大凡一种宏伟灿烂、经久不衰的著作，它的价值往往是多方面的。被公认为集大成者的韩非，其著作也正是如此。韩非的思想十分广博，传统将他的思想当作法家思想的代表，实际上还不够。他的思想，不仅仅集先秦法家的大成，而且也

是先秦各种思想成果在他头脑中经过深刻反思后的产物,而更是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与复杂诡诈的社会道德在理论界的投影。同时,韩非又是一个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语言文学大师,他的著作,不但记述了很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民间传说、寓言故事,反映了先秦时代丰富多采的社会风貌,而且文势雄伟峻峭,析理周详透辟,辞采华美酣畅,是先秦四大散文巨著之一。所以,《韩非子》既是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渊薮,又是绚丽灿烂的文学明珠;既是珍贵丰富的史学宝库,又是典型精粹的语言资料。它对于我们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历史以及语言,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谁想了解和研究中国的文化,《韩非子》是不可不读的。而在阅读它之前,我们也有必要对有关问题略作阐述。

一、韩非的生平事迹及其时代对他的影响

古代关于韩非生平事迹的记载很少。最为详尽的记载是《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可资参考的资料有《战国策·秦策五》,《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韩世家》、《六国表》,以及《韩非子》中的《存韩》、《问田》等。根据这些材料,可知他是战国后期韩国的宗族公子。当时的韩国在七国中最为弱小,常遭强秦的侵袭,国土日削,濒于危亡之际。正如韩非所说:“韩事秦三十余年”,“与郡县无异也”,“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①。而当时韩国的内政,也混乱不堪。韩王暗弱昏乱,“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谬”^②;“臣有大罪而主弗禁”,使“当涂之人擅事要”,而法术之士“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③;“是以贤者懈怠而不劝,有功者黥而简其业”,完全是一派“亡国之风”^④。韩非身为韩国宗族,虽天生口吃,却善于写作。他目睹韩国的削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劝谏^⑤,但都未被听用。于是他又写了《难言》、《和氏》等进奏韩王,

以和氏献璞自比，再次劝韩王纳谏听言，运用法术来治国图强。当时堂谿公劝他不要“舍乎全遂之道”而去提倡危身殆躯的法术，但韩非认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所以他坚决表示：为了民众的“资利”，决不怕“乱主暗上之患祸”^⑥。对于韩王不修明法制，不求人任贤、奖励耕战、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却反而听信虚言浮说，尊重儒侠，放任工商牟利买官，韩非十分愤慨。于是他针对时弊，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写成子《孤愤》、《五蠹》等十多万字，将自己的满腔热血和愤懑化成了千古不朽的光辉篇章。同时，他为了谋求强国方略，曾在荀况入楚后就学于荀况^⑦。他的同学李斯看见他的文章，自愧不如。当时，士人来去很自由，所以李斯在荀况那里学成了帝王之术，不愿“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而离开故土入秦，也正是当时的“士之情”^⑧。但韩非仍报效宗国。不过，他直到韩王安即位后才被重视。韩王安二年（前237年），曾与韩非研究削弱秦国的策略^⑨。韩王安五年（前234年），秦王政看见了《孤愤》、《五蠹》等文章，深有感慨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之游，死不恨矣！”李斯说：“此韩非之所著书也。”^⑩于是秦国猛攻韩国，韩王只得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秦国后，上书秦王，主张保存韩国，当即遭到李斯的反对^⑪，所以秦王没有信任使用他。更由于韩非在秦王面前说了姚贾的坏话^⑫，所以李斯与姚贾合谋陷害韩非，在秦王面前说他“终为韩，不为秦”，劝秦王“以过法诛之”^⑬。秦王听信了他们，就把韩非交给狱吏去惩治。于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王申诉，但终于未能如愿。等到后来秦王反悔，派人去赦免韩非，韩非早已死在云阳（位于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狱中了。

由上述种种可知，韩非首先是一个始终“为韩”的爱国者，而同时又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理论家。他的学说，受到了秦王政的赞赏，直接促成了秦王的反儒意识与君主专制主义的策略，为秦统一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制国

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所以，韩非尽管被杀害了，但他的政治理论却并未因其人亡而泯灭。相反，连李斯也称他的学说为“圣人之论”、“圣人之术”^⑭，把它作为治秦的方略。可以说，他的思想直接促进了在中国延续达二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把中国的历史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主宰了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所以他也被后人看作为“当世之圣人”^⑮。当然，他那种为了民众的利益而不惜牺牲的思想境界^⑯，以及“远见而明察”、“强毅而劲直”的性格特点^⑰，既使他不容于世而一生穷途，又使他发愤著书而光耀千古。这也往往是一个忠于谋国拙于谋身者的归宿。不过，韩非那公而忘私、一切为民众谋利益的思想，一方面具有真实性，即真实地反映了韩非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献身的斗争精神；但另一方面也带有欺骗性：它既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韩非自己。因为归根结底，得利的还不是韩国的统治者？哪会是全体民众呢？

须补充说明的是，史载韩非死于秦王政十四年（前233年）^⑱，但却未记其生年。现代学者根据各种资料推测其生年，主要有两种说法。钱穆认为：李斯初为小吏，后来跟从荀卿学习，入秦时大概在三十多岁。韩非与李斯曾同时就学于荀卿，而韩非入秦被杀时（前233年），李斯在秦国已15年了。如果韩非与李斯年龄相当，那么韩非死时应在40到50岁之间。从韩非卒年向前推算，那么韩非当生于韩釐王十五年前后，因而定其生年为公元前280年^⑲。现在大部分辞书都采用此说，其实未必正确。因为古人同学，不一定就同年，像曾参与仲由相差37岁，却同时就学于孔子。因此，关于韩非与李斯年龄相当的假定并不可靠。而且，李斯入秦时究竟多大年龄，也没有确实的证据。所以这一结论值得重加探讨。陈千钧认为：韩非约生于韩釐王元年（前295年）^⑳。这种说法较为合理，可取。

韩非的思想催化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

方面,更重要的是,韩非的思想是那一个时代的产物。战国时代,周室衰微,各诸侯国“上下交征利”^{②①},因而“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谖”,“贪饕无耻,竞进无厌”,“非威不立,非势不行”^{②②},弱肉强食成了社会公则,无论是国内君臣之间,还是各国诸侯之间,完全受制于一种赤裸裸的唯利是图的强权政治。所以,儒家提倡礼乐教化,墨家宣扬兼爱非攻,道家主张还淳返朴,都无济于事。只有法家的学说才最适合时世。法家自齐国管仲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②③},发展到晋国赵宣子的“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②④},郑国子产的铸刑书^{②⑤},晋国的铸刑鼎^{②⑥},郑国的用竹刑^{②⑦},魏国李悝制定《法经》^{②⑧},楚国吴起的变法^{②⑨}。而到公元前359年的商鞅变法^{③⑩},更是以法治全面代替礼治,以军功代替世禄、以君主集权的封建官僚政治全面代替领主分治的封建贵族政治的革命。他的变法,使秦国一跃而为国富兵强的大国。实践说明,只有变法才能强国。这样,总结历史上的法治经验及其教训,就成了当时的现实要求。韩非,正是在这种时代的要求下脱颖而出,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理论和实践,批判和吸取了先秦其他各家的思想,针对当时的世道人心而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体系。他看到: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争之世”^{③⑪},这种“争于气力”的现实折射到政治理论上,便形成了他那富国强兵、崇尚实力、推行强权政治的思想。他又看到:“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③⑫}。这便是他主张厚赏重罚、大谈人性自利的现实根据。他又看到:“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③⑬},“大臣挟愚污之人”,“惑主败法”^{③⑭},“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国”^{③⑮}。这种狡诈复杂的政治斗争,便是韩非大谈君臣异利、宣扬形名法术之学的现实根源。战国末年,群雄割据的局面已快结束,时代的潮流正向着大一统的帝国君主集权制的方向推进,这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也就是长久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必然地要求来一次总结。韩非的君主独裁与文化专制主义思想,无疑也是当时统一

集权的历史趋势的产物。

总之,韩非的思想不过是当时的历史现实在理论界的投影而已。明确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就往往会对韩非思想提出种种不切实际的苛责。如王充说:“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韩子岂不知任德之为善哉?以为世衰事变,民心靡薄,故作法术,专意于刑也。夫世不乏于德,犹岁不绝于春也。谓世衰难以德治,可谓岁乱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国,犹天地生万物。天地不为乱岁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⑤6}。”其实,世的确不乏于德,岁的确不绝于春。但思想深刻的王充却也疏忽了:衰世之无德,犹秋冬之无春也;韩非思想之产生于乱世,犹西风之产生于秋冬也。倘有德,还算什么乱世?倘为春,还像什么秋冬?韩非的学说,虽然像西风一样凛冽肃杀,但它是秋冬似的时代的产物,同时又充分地展示和说明了那一个时代。王充的指责,显然是没有洞察韩非思想产生的时代根源而作的错误批判。现代有人说韩非的学说“完全是一种法西斯的理论”^{⑤7},显然是重蹈了王充的覆辙。当然,传统认为“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⑤8},虽非属苛责,却也同样抹杀了法治思想产生的现实根源,是应该加以批判的^{⑤9}。

二、《韩非子》的编集和流传

韩非的“书”在战国时就已经在流传了^{⑥0},但那时流传的不过是单篇的文章。至于《韩非子》的编定成集,有人认为是韩非的弟子所为^{⑥1},有人认为是刘向所为^{⑥2},其实都不妥当。我认为,《韩非子》是秦灭韩后至李斯被杀前(即公元前230年至前208年)秦朝主管图书档案的御史编定的,而到汉朝文帝、武帝之时,它已广为流传了^{⑥3}。当时它称为《韩子》^{⑥4},有十万余字^{⑥5},分为55篇^{⑥6},不分卷^{⑥7},可见它还只是写在竹简上。魏晋以后,它被抄上了卷子,分二十卷^{⑥8}。由于宋代开始人们尊称韩愈为“韩子”,为了避

免混淆，有人就将它改称为《韩非子》^④。此后或称《韩子》或称《韩非子》就没有定准了。

自秦至宋，历代虽有《韩非子》流传的著录，但那时的本子现在已无流传了。唐、宋时代的《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群书治要》、《意林》、《太平御览》等虽辑录过《韩非子》，有助于我们了解它在唐、宋时代的面貌，但它毕竟只是些断章片言，而且经过删改及抄刻，错误难免，参阅时必须慎重斟酌。据清代人的序跋^⑤，可知乾嘉时代尚存南宋乾道改元中元日（即1165年农历七月十五）黄三八郎的印本，这是现在尚可考见的最早刻本，但它也已亡佚了。近世一些校注者说自己用宋本校勘^⑥，都不足信。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不过是这宋刻本的影抄本及仿刻本而已。这种能反映宋本面貌的影抄本及仿刻本现传有三种。

一是张敦仁（字古馥）在乙丑年（1805）借到了李奕畴（字书年）所藏的宋刻本后请人影抄的^⑦，这抄本后未刊行，影响不大^⑧。

二是吴肅（字山尊）在丙子年（1816）借到李书后叫人影抄的，次年付梓，由顾广圻（字千里）负责校刊，于戊寅年（1818）五月刻成，顾广圻所作的《韩非子识误》也附刊于后。由于吴肅将它题名为《乾道本韩非子廿卷》，所以习称“乾道本”。其实，它是宋代乾道刻本的影抄本的仿刻本，其中一些明显的错误已被改正了。所以若究其实而正其名，当称为“吴氏仿宋刻本”才较准确。这本子是学术界公认的善本，后世翻刻者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浙江书局光绪初年刻《二十二子》时翻刻的本子^⑨。这本子误字不少，不足称善^⑩，但由于容易得到，所以后来有人把它当作吴肅本来进行翻刻^⑪，甚至有很多人把它当作乾道本来进行校勘，未免以讹传讹。

三是清代钱曾（字遵王）述古堂影抄的乾道本《韩非子》，黄丕烈曾用李书年所藏的原印本对它作过精心的校勘，将不同的地方

都用朱笔写在述古堂影抄本上。此书后为上海涵芬楼所藏,1919年被编入《四部丛刊子部》影印出版,习称“四部丛刊本”,其版式与吴薰仿宋刻本基本一致,很能反映乾道本的真实面貌。

元代也有《韩非子》流传,但元刊本却不易见到^⑧,我们只能在明代的《韩子迂评》中看到元代何乔在至元三年(1337)写的序。何乔的原校本在明末就已失传了^⑨,不过,该校本在万历六年(1578)被门无子(吴郡人,姓俞)所得,他对该本作了些订正、评注,定名为《韩子迂评》,让陈深(字子渊)负责刊刻,于次年刻成。这种本子,脱文较多,甚至连《奸劫弑臣》、《说林下》的篇目都脱去了,所以又称“五十三篇本”。由于这种本子与上述的乾道本有很多不同,很可能源自另一种宋本,所以为校勘学者所重。万历十一年(1583),门无子看到了赵用贤刻的足本后,又让陈深重加校补,所以,重校本虽然篇目仍为五十三篇,但已是足本,而且有些文字也被改动,与初刻本不尽相同了。

明代除《韩子迂评》外,还有一些版本都值得重视。

一是正统十年(1445)刻的《道藏》,其中的《韩非子》编于“匪”、“亏”两函,1923年至1926年上海涵芬楼影印了这部《道藏》,文物出版社等又于1988年影印了涵芬楼本,所以现甚易见到。该书脱文与《迂评》初刻本基本相同。由于它成书较早,较能反映早期刻本的面貌,所以一向为校勘家所重。陈国符说:“正统《道藏》所收书籍,多避宋讳。盖虽系明刻,而渊源固自政和《道藏》也^⑩。”据此,则今传《道藏》中的《韩非子》及《韩子迂评》这种五十三篇本,可能都源自宋代的政和《道藏》。正统《道藏》在明代又有翻刻本,顾广圻、卢文弨都用道藏本校过而校出的文字不尽一致,可能是因为他们所用的不是同一个版本。

另外,正德年间所刻的《韩非子》残本十二卷以及嘉靖辛酉(1561)张鼎文校刻的《韩非子》,也同样可贵,只是现在已很难见到了。正德本是五十三篇本,张鼎文本的脱文虽与道藏本、迂评

本基本相同，但《说林下第二十三》的篇目却没有脱去，所以它是一种五十四篇本^⑩。

由上述可知，万历十年（1582）以前流行的本子，都是一种缺刻本。万历十年，赵用贤购得五十五篇的宋本《韩非子》，便据近时流行的各种本子校勘改定后与《管子》一起刊出，后人因称“赵用贤本”或“管韩合刻本”。由于它是足本，所以一问世即享有盛誉，翻刻赵本者很多^⑪，连《韩子迁评》也据以作了补充。

万历以后，也有一些人兼采赵用贤本与迁评本亲校刻《韩非子》，象凌瀛初本、赵如源王道焜同校本都是这样。这种翻刻本其实无多大校勘价值。但自从陈启天用凌本校勘后，凌本也颇为后人所重。至于赵王同校本，则对日本学者影响颇大，物双松读、蒲阪圆增的《增读韩非子》、津田凤卿的《韩非子解诂》等都是用赵王同校本为工作底本的。

明代还有很多评本或节录类编本流行，像归有光辑评的《诸子汇函》本，焦竑注释、翁正春评林的《注释九子全书》本，陈深的《诸子品节》本，孙鑛批点的《六子全书》本^⑫，陈仁锡的《诸子奇赏》本等等。这些都只是一般的文学读本，无甚校勘价值。只有万历辛亥（1611年）张榜芟削节录赵用贤本而成的《韩非子纂》二卷，虽被删改了不少，都常为后人校勘时取资。

清代除吴鼐刻仿宋本值得称道外，王先慎于光绪丙申（1896年）撰成并刊行的《韩非子集解》也值得重视。此书校释虽然较为粗疏^⑬，但还是有所发明的。更由于它汇集了多家校释，便于阅读，所以成了本世纪最通行的本子，不断被后人翻印。

本世纪《韩非子》的流传更为广泛。

1910年衍圣社刊印了吴汝纶的《点勘韩非子读本》，虽校释极略，但也有发明之处。

1919年武昌刊行了尹桐阳的《韩子新释》。该书于史实典章的解释成就较高，对词语的解释也时有可取，但也多任意杜撰之说。

194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启天的《韩非子校释》。该书收录的校释资料较为丰富,作者的校释也有所发明。不足的是,作者未能用吴肃本校勘,而改动原文也较为轻率,征引他人之说也偶有笔误。

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该书内容丰富、篇幅甚巨,一向被人们奉为典要。作者的校释也有所发明,特别是常能以《韩非子》前后之文互证,以阐发韩非原著的义蕴。可惜的是,该书的校释乃至案语,常径引自陈启天的《校释》,而其附录,也多径引自陈启天的《韩非子参考书辑要》,所以失误不少^④,因此阅读采摭此书,必须谨慎核对各种版本及各种校释原著,不可盲从。

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梁启雄的《韩子浅解》。此书校勘,失误亦多^⑤。其注释大都取自前人,虽时有发明,但也有误解之处。

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勋初等校注的《韩非子校注》。该书校注虽有失误,但与以往的校释本相比,其校勘最为严谨,其注释最为通俗。

台北国家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秋圃的《韩非子浅释》,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了邵增桦的《韩非子今注今译》,因未见到,无以论述,但也足见当今《韩非子》流传之盛。至于本世纪各种选注选译本,就更多得不便详述了。

三、《韩非子》的真伪

辨伪之事,大概肇始于汉代,班固曾指明《神农》、《天乙》等书是后人伪托^⑥,但并没有怀疑《韩子》。宋代疑古之风大盛,司马光怀疑《孟子》,却也没怀疑《韩子》,因此看了《初见秦》后认为韩非要灭掉自己的宗国^⑦。但宋代有人反驳说:“后人误以范雎书厕于其书之间,乃有举韩之论,《通鉴》谓非欲覆宗国则非也^⑧。”认为

《初见秦》出于范雎之手固然谬误^⑨，但《韩子》的真伪问题却已被提出来了。明代以后，中日不断有人对《韩非子》提出怀疑，论及其真伪的论著有：张鼎文《校刻韩非子序》，门无子《韩子迂评》，太田方《韩非子翼翥》，松皋圆《韩非子纂闻》，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吴汝纶《点勘韩非子读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容肇祖《韩非子考证》，刘汝霖《周秦诸子考》，蒋伯潜《诸子通考》，陈千钧《韩非子书考》，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张心澂《伪书通考》，高亨《诸子新笺》，陈启天《中国法家概论》及《韩非子校释》，郭沫若《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梁启雄《韩子浅解》，赵海金《韩非子研究》，周勋初《韩非子札记》等等。综合各家之说，《韩非子》只有《问辩》、《定法》、《诡使》、《六反》、《五蠹》、《显学》六篇是无人怀疑的。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韩非子》的真伪作一番考辨。上述各家对《韩非子》各篇所提出的怀疑之处及其考证，我们作了归纳，列于每篇“题解”之末，凡 38 篇。至于另外 11 篇，虽也有人怀疑，但并没有举出什么证据，显系武断，故今置而不论。其实，就是有怀疑证据的 38 篇，上述各家的考证尚不足以成为定论。

首先必须辨析的是考定伪作的标准。从各家的考证来看，这种具体的审查标准可归纳为七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且考虑到伪作考辨的方法论意义，我们试从这七类标准入手进行考辨，而不逐篇加以考证。

（一）认为该篇的思想内容不符合韩非的思想体系因而被判定为伪作的，涉及面最广。如胡适认为：根据学说内容来衡量，《韩非子》只有十分之一二可靠，就是司马迁所举的《孤愤》、《说难》等也都靠不住^⑩。其实，这种以所谓的“学说内容”作为辨伪标准的做法是很靠不住的。因为史籍的记载靠不住，《韩非子》也大部分靠不住，那么我们又从哪儿去全面、准确地了解韩非的“学说内容”呢？把自己对韩非的成见当作韩非的思想，然后用它来衡